

“人类世”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新走向

赵睿夫

(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福州，350108)

摘要：基于研究传统中的“弱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在驳斥“人类世”思潮中的诸非人类中心主义理论流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指责的同时，阐发了一种“人类世”思潮背景下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强调“长期性”的历史时间观，主张“表层直接影响力—深层综合影响力”的人类能力观，反对“人类特权”而强调“差异化再分配”的人类权责观，对人类生态共同体建构的“共同利益”进行了补充诠释，并侧重于“使用价值”及其自然性，进一步厘清了生态中心主义“内在价值论”与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界限。生态马克思主义在生态价值观维度的新走向纾解了人类中心主义的部分既存问题，但仍然具有一定的理论局限性。

关键词：人类世；生态马克思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生态学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25)06-0148-10

随着“人类世”(Anthropocene)概念及相关理论在21世纪的火热，一种更为强调知识流动性、批判反思性与话语创新性的思想氛围开始在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场域中酝酿、展开。在“人类世”思潮的影响下，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日益意识到对自身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基础进行“版本革新”的理论必要性，并在事实上阐发了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价值观版本，构成了对既往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中“弱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的补充与修正，试图更为清晰地呈现出马克思主义的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相统一的生态本体论在生态价值观维度的指导意义。与此同时，无论如何在广义生态价值观维度上“柔化”，对于自然价值评估中“人类尺度”的坚持，仍然是这种“人类世”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版本的牢固底线，而在此基础上，研判生态马克思主义在生态价值观维度的新走向，构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中的人类中心主义

一种环境政治理论或流派通常会有其相对稳定的生态价值观基础，因为对于“人与非人的自然界及其诸存在何者具有优先性”这一基本哲学问题的回答在事实上决定了这种环境政治理论或流派的总体依据，因此，可以将之表述为一种特定环境政治理论或流派的“生态价值观基础”。讨论一种环境政治理论的生态价值观的具体类型时，最为直观的划分方法为“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二分法。但随着相关研究的逐渐深入，简单的、一刀切式的二分法已经难以适用于普遍的研究——比如，“人类中心主义”在现代产生了“强人类中心主义”(Strong/Hard Anthropocentrism)、“弱人类

收稿日期：2025-03-06；修回日期：2025-08-16

基金项目：202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视域下的绿色生产力理论研究”(25CKS124)

作者简介：赵睿夫，男，湖北荆州人，法学博士，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联系邮箱：zrffzu@163.com

中心主义”(Weak Anthropocentrism)、“谦逊的人类中心主义”(Humble Anthropocentrism)、“审慎(开明)人类中心主义”(Prudential/Enlightened Anthropocentrism)、“软人类中心主义”(Soft Anthropocentrism)等诸多动态性变体。而“生态中心主义”也产生出“生物中心主义”(Biocentrism)、“动物中心主义”(Zoocentrism)、“自然中心主义”(Naturecentrism)等诸多理论形态。而在21世纪以后，以“新唯物主义”为代表的一些带有解构倾向的生态哲学学说将一种尝试超越“人类”与“自然”二分的“物质中心主义”带到了生态价值观讨论的场域之中，造成了近期生态价值观讨论复杂度的进一步提升。因此，对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价值观基础的探讨，自然会面对这些不断变动的生态价值观类型之间的“意义微调”及由其所引发的理解困难。

在充分认识上述研究背景的前提下，学界对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价值观基础的理论认识可以被概括为两种看法，即“生态中心主义论”与“人类中心主义论”。“生态中心主义论”的主要支持者包括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特德·本顿(Ted Benton)、罗宾·埃克斯利(Robyn Eckersley)、乔尔·科威尔(Joel Kovel)、凯特·索普尔(Kate Soper)、戴维·奥顿(David Orton)等人。从总体上看，将“生态中心主义”视作自身生态价值观基础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普遍批判以“支配/控制自然”等理念为构成内容的“人类中心主义”，认为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不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进一步“适应自然”^[1]。这部分学者大多自一开始就反对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能动优势，故而排斥马克思主义中对于自然产生创造性影响的内容，以至于拒绝承认马克思“人与自然和解”(reconciliation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2]思想的证成可能，由此催生出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二分式理解——用克里斯蒂安·斯塔齐(Christian Stache)的话说：“(本顿等人)试图把一个好的自然主义的马克思和一个坏的人本主义的马克思剥离开来。”^[3]与此同时，持“生态中心主义论”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其内部也存在着差异，比如相对开明的索普尔认可马克思主义同时具备“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两种理论解释空间^{[4][87]}，而更为激进的埃克斯利则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流派划分为“正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Orthodox Eco-Marxism)和“人道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Humanist Eco-Marxism)，并指认二者都未能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价值观影响，强调只有把生态中心主义同社会主义结合，生态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生态中心主义的维度可以证明，这两个生态马克思主义流派都不加批判地接受了马克思的历史观及其造物主式的人类概念，由此延续了工具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看待世界的非人方式。”^[5]由此可见，持“生态中心主义论”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们亦能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立场，但在如何处理或曰应对的立场上存在争议^{[4][77]}。

显然，对于持“生态中心主义论”的学者而言，“人类中心主义无法真正解决生态危机”是被普遍接受的认知前提，这使得他们对(生态/绿色)资本主义的批判力度易于被“人类中心主义”这个更大更抽象的“人化”哲学观念标靶所影响，以至于他们在“绿化”自身理论的同时更难以保持“红色”的基本立场。用张云飞的话说：“问题是，生态中心主义属于一种不过问政治问题的纯粹的绿色思潮，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过问政治问题的鲜明的红色思潮，如何实现二者的融合存在着理论上的和政治上的障碍。否则，红色存在着滑向绿色的可能。”^[6]同时，持“生态中心主义论”的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态度是暧昧的，他们既不想丢失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话语，又不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在生态问题应对上的人本主义色彩，陷于一种“鱼与熊掌”的理论困境。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科威尔等学者尝试将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话语结合起来，从而诞生了一些类似“生态学社会主义”“动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生物中心主义”的理论版本，强调“生态社会主义与资本作斗争，不仅是为了确保下层阶级的福祉，也是为了生命本身……这需要将生态中心主义放在首位，把自然的治愈和生命的改善放在首位”^[7]。显然，这种理论尝试的核心论证逻辑是将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批判者与生态危机拯救者的角色整合于一体，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话语与生

态(生命)系统的哲学叙事嫁接到一处，以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与共产主义理想的合生态性论证生态中心主义并不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相对立，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应当(且可能)在生态价值观维度上受到生态中心主义的“革命性改造”^[8]。

另一方面，“人类中心主义论”的主要支持者包括戴维·佩珀(David Pepper)、瑞内·格伦德曼(Reiner Grundmann)、乔纳森·休斯(Jonathan Hughes)、詹姆斯·杰克逊(James Jackson)、奥康纳等人。在这个理论立场上，佩珀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经典四要素界定能够提供一种最为基本的理解基础：(1) 人类中心主义的形式；(2) 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据的生态危机根源分析；(3) 社会变革的集体性、批判性方法；(4) 绿色社会的社会主义构建方案^[9]。这一对于“生态社会主义”的定义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持“人类中心主义论”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基本观点。据此，持“人类中心主义论”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普遍从下述三个角度出发论证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重要性。

一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对于“人”这一主体性历史存在在生态维度上的高扬。这种高扬至少可以被表述为“以人类实践为唯物主义哲学革命的出发点”“以人类本质为论述自然界客观先在性的切入点”“以人类经验为资本主义生态破坏批判的着眼点”“以人类解放为未来社会构想的落脚点”等具体命题，表明人与自然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辩证统一的一体两面，脱离“人”的存在而空谈无人的自然界或曰“荒野”很难被理解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此即奥康纳质疑奥顿等人的“社会主义生物中心主义”(Socialist Biocentrism)的理论根源^[10]。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在这方面的经典论述有：佩珀的“马克思的‘支配’不会引起生态难题，而是解决它们的起点……它宣称，真正的人类自由可能只存在于‘第二自然’之中……这种观点是‘人类中心论’的而非‘生物中心论’的”^{[9](340)}；格伦德曼的“马克思的自然观显然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他并未为考察自然设定道德囹圄”^{[11](53)}；休斯的“这种自然和人类或者社会的相互渗透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一个突出特点……生态问题应该从一个广义和延伸的人类中心主义视角来评价”^[12]；杰克逊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严厉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概念与他对通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来克服人类与自然分离的思考相联系”^[13]；等等。总之，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化诠释”的总出发点，人类中心主义(及其版本更新)构成了相当一部分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生态价值观基础。

二是强调人类中心主义及“控制自然”的观念并不是生态危机的“原罪”，真正使人与自然陷入对立状态的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人类中心主义及“控制自然”观念的利用。“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人类中心主义持肯定态度。他们认为，以控制自然为核心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之一，但是‘并不认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会造成生态危机，而是强调只有当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后，它才成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14]“控制自然”观念是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的核心内容，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人类中心主义论”者与“生态中心主义论”者理论交锋的关键战场。在这一点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成为持“人类中心主义论”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们重要的理论依据。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做出了关于“两个提升”的重要论述：“只有一种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15]这一论述鲜明地阐发了由生产与分配的发展所带来的人类与自然的动态关系，呈现出人与自然间基于劳动实践的“一体性”特质。换言之，人的相对特殊性本身即源于自然，人类控制自然能力的提升指向“人与自然作为统一整体”^[16]。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控制自然”观念已经不再停留在“主体控制/支配客体”的浅层表意上，而是喻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与控制。这种表意的转换使得人类中心主义内部普遍存在的人与自然的主客对立问题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纾解，同时也揭示出生态马克思主义充分理解运用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的理论必要性：“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抽象的‘控制自然’的

观念以及以此为价值基础的科学技术本身都不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只有当‘控制自然’的观念被纳入资本主义现代性价值体系之后，才导致技术的非理性运用和生态危机。”^[17]

三是指出人类中心主义存在广阔的理解、诠释与改造空间。通过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或观点精神，人类中心主义能够被动态地调整为一种具有更强资本主义批判力与生态危机应对力的革新“版本”的生态价值观基础。“人类世”研究者查克拉巴提曾明确给出了关于“强”与“弱”人类中心主义的区别性定义：“强人类中心主义总是与基于纯粹的人类偏好对自然进行不灵活的、本能的利用或剥削有关；弱人类中心主义则是通过理性思考形成非人类对人类繁荣十分重要的结论后得出的立场。”^{[18](64–65)}与这种研究方法类似，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往往在承认马克思主义或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根基时，尝试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程度限定或阶段区分。换言之，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作为其生态价值观基础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从来就不是直接地化用或引入，而是在批判分析基础上的动态生成。在这方面，格伦德曼强调“重返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理念，并将传统的主客对立式的人类中心主义版本革新为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人本主义”^{[11](18)}，而非把人类视作理所应当的自然破坏者、把自然界视作工具或手段的旧式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侧重于“理解生态问题需要文化参照点”“推动生态评价与保护需要社会性操作”与“正确看待人与自然关系需要总体性观点”的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能动地改造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对佩珀等人的人类中心主义理解产生了重要影响。休斯则将“人类中心主义”明确与利己主义、资本主义、工具主义划清了界限，阐发了一种强调自然的审美和栖居价值的人类中心主义版本，因为这些价值对于人类来说具有不可替代性，所以人类必然应当反对“反自然”。

二、“人类世”思潮下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价值观革新的根本原则

从“人类中心主义论”的视角观之，依据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人本性特质以及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红绿”环境政治理论流派的政治性诉求，“非人类中心主义或许只能是一种幻想……‘人的价值观永远只能基于人类(或以人类为中心)的角度’”^{[18](64)}。与此同时，为了在“人类世”思潮背景下更好地规避生态价值观基础差异所带来的批评，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始终在长期涉及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与伦理的论证与争辩中表现出从“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旧版本”到“重塑人类中心主义的新版本”的理论趋势^[19]。在此前提下，尽管阵营内部仍然存在一些差异，持“人类中心主义论”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总体上仍然支持下述三个观点，此即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理论革新的根本原则。

其一，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否定自然客观力量的人类中心主义社会一元论，其在方法论维度上对于自然与社会的必要区分并不意味着在本体论维度上忽视了自然及其存在本身。福斯特等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极粗陋的、反自然的、用社会消解自然的“强人类中心主义”版本，“人类中心主义与提倡独断论的‘人类中心主义’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20]，对于这种版本观念认知程度的不同是造成马克思主义频受指摘的一个重要原因。总体而论，马克思主义与“强人类中心主义”存在本质差异的理论依据至少包括“自然辩证法对于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尊重”“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人的自然性的充分认定”“马克思恩格斯高度承认生态科学的研究的理论价值”“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和生态价值形式理论对于生态学意义重大”“马克思主义强调非人类动物物种和人类在智力方面的密切关系”“马克思的美学思想反映出其对内在价值论的充分认识”等方面。这些侧重于体现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意涵的理论观点回应了“人类世”思潮中部分“生态中心主义论”者对马克思主义生态价值观的质疑。基于“人类世”思潮兴起以来“致力于自然和社会辩证法的人与致力于激进社会

一元论的人之间在生态学左翼分析上的鸿沟正在不断扩大”^[21]的理论事实，马尔姆、霍恩伯格、斋藤幸平等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阐述了“分析性二元论”(Analytical Dualism/Analytical Distinction)，用以与强人类中心主义划清界限。这种理论尝试表明，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洞悉了既往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的内生性问题并正尝试进行优化。即便是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规避了人类中心主义局限性的“弱人类中心主义”也存在着“打补丁”的必要性与空间。

其二，对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基础，需要明确承认与坚决支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辩证生态价值观的建设性意义与责任限度。在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对“人类世”的认识从根本上看仍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因为只能从人类的视角出发理解自然特性。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更接近于一种并不与保护自然相冲突的人本主义。因为要充分应对生态危机，就必须承认人在认识与改造世界上的特殊能力并将之运用于自然保护。按照这种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解，从生态中心主义角度出发难以谈论生态危机，因为生态危机及其克服需要人类的深入筹划与参与，尤其是在劳动实践的意义上，“马克思坚持认为，只有在一定社会关系下的人类劳动才产生价值，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价值范畴必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22]。这一层面的辩护实际上指向人类中心主义的“建设性”优势，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保有的理论阵地，而不能由于对“人类中心主义”标签的畏惧而放弃“人类世”必要的社会转型或生态革命的实践潜能。另外，安格斯等学者也充分认识到了在“人类世”背景下防范生态价值观“矫枉过正”的理论必要性，不能因为人类需要对“人类世”负责就直接得出类似克里斯特(Eileen Crist)等“生态中心主义论”者的“人类就是问题”(people are the problem)及“责怪所有人类”(all humans are to blame)的武断结论^{[23](226–227)}。总之，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坚持不能将问题抽象地归咎于人类整体，在明确“人类是唯一至少有潜能来创造生态奇迹者”^[24]的基础上，正确认识人类物种的责任边界，不能因为对人类责任的无限强调得出消极结论，而应理性推动“人类世”生态危机的政治性反思与应对。

其三，“人类世”思潮中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马克思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的版本革新提供理论资源。在社会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人类世”危机开启了一场关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版本修订。唯物史观认为，人与自然在生态本体论层面有着协同共生的关系，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在生存过程中与资源、经济、制度、生态、社会环境产生的一种融合关系^[25]，因此，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不应当陷于非此即彼的割裂对立之中。正如福斯特所言：“马克思主张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需要与自然进行持续的对话，作为我们自身存在的基础。这与自然、与地球的共同进化和可持续关系至关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中心主义意味着否认人类和人类社会与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的普遍新陈代谢’的彻底分离。”^[26]斋藤幸平也强调，“人类世”中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对于解决目前的生态危机问题和摒弃对非人类自然的工具性态度十分重要，但这些观念和逻辑只能基于人类的认识与实践才能获得，并且不可避免地受到人类利益和观点的制约。总之，在“人类世”思潮的自反性氛围中，福斯特等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生态中心主义的关于“承认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反对对待非人自然的工具性态度”“尊重诸物种的生存权利”^[27]等主张对于建构自身生态价值观基础具有资源性意义，且这些观点并不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生态系统运作方式”^[28]相矛盾。

总结而言，在“人类世”思潮的影响下，生态马克思主义呈现出对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基础进行版本更新的理论趋势，而这种革新体现出如下三方面原则：一是以“分析性二元论”回应“人类世”的生态中心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生态价值观的质疑，并由此指出对弱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进行版本更新的理论必要性；二是着眼于论证马克思主义总体性辩证生态价值观的建设性优势与责任边界，认为生态危机的解决需依托于人类的能力，同时亦应反对将问题归咎于人类整体；三是“人类世”

思潮中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能够为人类中心主义的版本更新提供资源。例如，生态中心主义关于人与自然整体性的主张，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人与自然观并不存在本质矛盾，因此，相较于将马克思主义置于生态中心主义的对立面，使马克思主义陷入向传统“强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倒退的险境，正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部分合理观念能够为“人类世”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更具建设性的理论资源。

三、“人类世”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价值观革新

按照佩珀对“弱人类中心主义”这一广义生态价值观版本的经典表述^{[9][41]}，其所使用的定义性修饰语包括“长期的”（时间观念维度）、“集体的”（主体组织方式维度），“人类需要优于非人需要”（主体权力维度），“用非物质的方式评价自然，不把自然视作工具或手段；为了人类的精神福利与利益而不破坏自然其他部分”（主体责任维度），“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维度）等。这些表述从时间观念、主体的组织方式与权责限定、最终目标等角度出发完成了对“弱人类中心主义”的概括，同时仍存在着进一步具体化、鲜明化的理论空间。顺应着上述描述方式，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人类世”思潮的影响下对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进行的新阐释，可以被概括为下述五个方面。

其一，“长期性”的历史时间观。任何一种生态价值观版本都具有清晰的时间观念维度，这种时间观念就是特定版本的生态价值观对于当下所处阶段或节点在宏观历史之中的定位的总体性认识。在“人类世”思潮将以百万年为单位的地质时间作为衡量生态危机及其应对的时间尺度的理论背景下，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自身生态价值观基础的版本更新必然呈现出对“长期性”的观照，指向一种对于技术中心主义、新古典经济学人类中心主义等“短期性”生态价值观的超越。更具体地说，在“人类世”思潮背景下，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所力图建立的“人类中心主义”版本在总体基调上并不着眼于短暂的当代性“框架修补”或技术方案的“紧急执行”。相较于短期的生态工作成效，这种生态价值观具有更长远的、以“持续改进”与“长周期革命”为导向的追求与目标，为“社会时间”视角补充了更长周期与更大跨度的“自然时间”视角。其“长期性”的时间观念以对“人类世”“资本期—共产期”分期的“客观的历史必然性”^[29]为典型理论表达，将“人类世”视作“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30]的长期性时间观念，并强调资本主义存在的长期性及其与人类的“长期性对立”^{[31][81]}。相比佩珀等人的“弱人类中心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人类世”思潮背景下开创的人类中心主义版本以更为清晰的对未来的阶段性划分补充了既往“长期性”论述中缺乏的“节点”意识，在这个意义上，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版本对作为“人类中心主义”核心主体的“人类”的不同历史阶段进行了区分，以此确定“人类”在漫长的“人类世”危机局面中的具体历史形式^[32]。

其二，“表层直接影响力—深层综合影响力”的人类能力观。一种围绕“人类中心主义”展开的生态价值观版本需要对作为自身理论阐述中心的“人类”的能力进行评估，而这种能力评估绝非最浅显意义上的生物学性质的评估。更为重要的是，必须清晰地表达“人类”这一特殊种群对于自然系统，特别是非人类的诸自然存在造成影响的能力水平。在“人类世”思潮的影响下，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们通过对“人类世”科学进展的跟进与响应，更好地理解与界定了人类。具体而言，“人类世”思潮背景下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对人类能力的理解具有两个不同的维度。一是表层的“直接自然影响能力”。在这个维度上，“人类世”的兴起宣告着人类能力的强大，即便是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中心主义或反人类主义，也很难忽视科学证据所指出的人类在自然影响（尤其是“地质影响”）上展现出来的能力。二是更深层次地实现真正“有利于维持生物多样性和稳定的人类文明的阶段”^{[23][14]}的综合自然影响能力。在承认人类能够理性地自我调控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并非“自发地破坏自然”的前提下，更优的人类文明阶段的实现，需要人类除“直接自然影响能力”之外的更多元的能力，比如对

“人类世”危机的重视、对生态主义运动的组织筹划、对地球工程技术手段的冷静判断等，此即马尔姆所言的“意识到自身的自然性，并停止自身对自然宰制”^[33]的能力、沃里斯所言的“反思能力”^{[31](49)}等。这些“综合能力”是“自然影响能力”的更高阶段表现，共同构成了“人类世”危机应对真正需要的“人类能力”，是对“弱人类中心主义”人类能力观的补充。

其三，反对“人类特权”而强调“差异化再分配”的人类权责观。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版本要回应的最为根本的问题是如何看待人类这一生态价值观主体的权利与责任。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即便是已经在技术中心主义等强人类中心主义版本的基础上进行了“弱化”，佩珀等人的“弱人类中心主义”也曾尝试“人类特权”^{[9](373–374)}的理论建构。“人类特权”即人类始终拥有按照自身意志来定义自然，并在与非人自然交互过程中占据绝对优先地位的资格。在“人类世”思潮下，“特权地位”已经成为西方生态现代主义试图通过技术手段管理地球、以生态环境治理谋求政治经济利益的典型体现，因而不断受到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判^[34]。由此，“人类世”思潮背景下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几乎不使用“人类特权”或近似概念，也不支持任何形式的“人类例外论”，而更多地从“权利”或“尊严”^[35]的角度论述人类在“人类世”中的角色定位。在“人类世”中，人类拥有满足自身需求、实现自身存续与发展、选择物种文明发展方向的基本权利，但绝不能认为自身拥有任意将自然视作工具的“人类特权”或试图把地球私有财产化的“所有权”，只有与“人与自然关系”的真正平衡不相冲突的权利才是“人类世”中“可保障”的人类权益。为了达成这种平衡，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强调人类需要承担其物种责任，但这一责任的具体分配不能笼统地、绝对平均地进行。由于工业革命，尤其是“大加速”以来资本主义框架对地球生态系统产生的重大影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当在更大程度上为生态破坏负责。这种负责表现为权利维度的“限制”，如反对“地球工程”在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实践尝试等。总之，在“人类世”思潮背景下，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在对人类的权责认识上更不侧重对“人类特权”的表达与追求，在强调对人类基本权益的不可动摇的保护的基础上，对人类的责任进行了依据“过程”的再分配。这种对“特权”的淡化、对“基本权益”的强调以及对“差异责任”的阐发构成了其对“人类世”的人类物种权责的主要认识。

其四，基于“共同利益”的人类生态共同体观。一种生态价值观，尤其是“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始终需要处理人这种社会性、群体性、合作性物种的共同体关系问题。在构建“弱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共同体关系的维度上，佩珀不止一次地强调“集体性”是“弱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本特点，并在实际上提出了至少如下三方面对生态共同体关系的理论思考：(1) 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控制依托于“集体”实现而非“个体”，尽管“个体”享受“集体”努力所带来的生态福祉；(2) “集体利益”或曰“共同体利益”是人类共同体得以凝聚的核心动力，这种“利益”必然是属人的，而不能是非人的；(3) 掌控人类“集体关系”并使之生态化的方案应当从“生产”维度着手，生产不仅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而且是生态共同体构建的基本要素。顺应佩珀的思考，“人类世”思潮背景下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推动了更新人类中心主义版本的尝试。如霍恩伯格所言：“人类世的罪恶并非源于任何特定人类群体的特性，而是源于我们的互动载体。人类要想为社会和生物圈的未来承担责任，就必须准备好重新思考如何设计我们彼此互动的游戏规则。”^[36]生态共同体的建构，或者说安格斯、沃里斯、布兰德意义上的“人类团结”(human solidarity)与“团结的生活方式”(solidary mode of living)，是“人类世”危机“破局”的关键。总之，“人类世”的生态危机既然是“行星级别”的，也就自然意味着适应时代背景的“人类中心主义”版本必须将人类理解为一种“集体主体”，“资本世”或资本主义逻辑宰制下的“人类世”局面被描述为人类生态共同体关系构建的首要阻力。为此，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对建构“人类世”生态共同体关系的“利益基础”进行了考察，这种利益基础可以被划分为至少三个方面：“存续性共同利益”“建设性共同利益”“抵制性共同利益”。其中，“存续性共同利

益”强调人类对自身种群生存与传承、避免“人类世的共同毁灭”^{[23][222]}的利益诉求，“建设性共同利益”强调人类对更好环境福祉与生产生活条件的利益诉求，“抵制性共同利益”则强调人类在抵制资本主义及其逻辑的统治与扩张方面的利益诉求，三者共同构成了“人类世”的生态共同体关系的团结基础。

其五，侧重于“使用价值”及其自然性的“内在价值论”诠释。尽管沃利斯等学者认为“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之间的差异仅仅是一种“追求自然平衡”的方式上的差异，而非目标层面的差异，以至于二者在很多生态运动诉求(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反思方面)上的实际差异“微乎其微”^{[31][49]}。但在对待“内在价值论”的态度这一问题上，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不能被简单地画上等号。换句话说，一种新的“人类中心主义”版本必须明确其对“内在价值论”的态度究竟如何，否则将陷入对人类与自然二元混淆的险境。在“人类世”思潮的背景下，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日益关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价值理论及内在价值问题。例如：斋藤幸平基于对马克思手稿的深度整理，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对于“内在价值论”的认识与理解及其“批判性”^[37]实质，认为马克思主义对自然价值问题的认识始终基于对资本主义生态破坏的指认与批判，而非单纯的“哲学”或“伦理学”思辨。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在反对“交换价值”支配一切的意义上突出了自然界的“使用价值”，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生态意义上强调的“内在价值”。在此基础上，福斯特等人论述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与美学维度上对于自然“内在价值”的充分认识，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自然物质的使用价值”(natural-material use values)的强调证明了其对自然界“物质性”的客观价值的承认，即“财富是人的劳动作用于自然物质的对象化产物”^[38]，此亦深刻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总之，在马克思的视域中，“内在价值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人与世界的感性—物质关系”^[39]。换句话说，对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从马克思主义对价值及内在价值问题的认识与理解出发论述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意蕴，绝不等于说马克思主义在生态价值观的维度上可以被“生态(生物)中心化”，因为“价值体系是人类活动的一部分”^[40]。

四、结语

在“人类世”思潮影响下，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动向呈现出对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的深度重构与理论推进。其动向核心体现为从五个维度对既有理论的拓展：在时间观上，突破“弱人类中心主义”笼统的“长期性”，引入地质时间视角并明确未来阶段的划分，讨论了人类物种的具体历史影响，使生态价值观的时间维度更具历史纵深与节点意识；在人类能力观上，构建“表层直接影响力—深层综合影响力”双重维度，弥补了对人类能力评估的片面性，强调反思、调控等深层能力对生态危机应对的关键意义；在主体权责观上，深化了对“人类特权”的批判性讨论，主张在保障人类基本权益的基础上按历史过程实施生态责任的差异化再分配，推动环境正义的国际维度发展；在共同体关系上，以“存续性、建设性、抵制性”共同利益为基础构建物种维度的生态共同体，明确了反对资本主义对于共同体构建的重要意义，丰富了生态共同体的构建路径；在对待内在价值论上，基于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基本内容，强调了使用价值的自然性，进一步与生态中心主义的内在价值论划清界限，清晰地呈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性人与自然关系观。这些动向使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更具系统性、针对性与时代性，为理解和应对“人类世”生态危机提供了更具深度的理论资源。

与此同时，生态马克思主义在“人类世”思潮背景下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版本更新也存在局限性。其一，“长期性”时间观虽强调历史纵深与宏观历史叙事，但易陷入对具体治理，尤其是国际环境治理合作方案的回避。其二，对人类“深层综合能力”的强调，虽补充了能力维度，却仍带有对人类理

性调控自然的理想化色彩，未能充分回应“人类世”思潮对于人类能力边界的质疑。其三，在权责分配上，“差异化再分配”虽指向环境正义，但可能忽视了资本主义阵营内部不同国家、群体在生态责任上的复杂博弈，导致实践中责任划分的模糊性。其四，对“内在价值论”的人类主体性限定虽进一步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与“内在价值论”的边界，但仍难以完全消解生态中心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本质疑，未能建立起更具解释力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理论。

参考文献：

- [1] 岩佐茂. 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M]. 韩立新, 等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7: 118.
- [2] BENTON T. Marx, animals, and humans: A reply to my critics[J]. Monthly Review, 2019, 71(1): 40–44.
- [3] STACHE C. On the origins of animalist Marxism: Rereading Ted Benton and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J]. Monthly Review, 2018, 70(7): 22–41.
- [4] 本顿. 生态马克思主义[M]. 曹荣湘, 李继龙,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 [5] ECKERSLEY R. Environmentalism and political theory: Toward an ecocentric approach[M]. London: UCL Press, 1992: 82.
- [6] 张云飞. 面向学科建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359.
- [7] KOVEL J. Ecosocialism, global justice, and climate change[J].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2008, 19(2): 4–14.
- [8] 张云飞. 自然的复活：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及其当代意义[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78.
- [9] 佩珀. 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 刘颖, 译.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
- [10] O'CONNOR J. Socialist biocentrism[J].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1991, 2(3): 93–94.
- [11] GRUNDMANN R. Marxism and ecolog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12] 休斯. 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M]. 张晓琼, 侯晓滨,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47.
- [13] 郁庆治. 21世纪以来的西方绿色左翼政治理论[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1(3): 127–139.
- [14] 崔赞梅. 从生态马克思主义到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轨迹探寻[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36(5): 123–130.
- [15]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23.
- [16] 刘香檀, 郁庆治.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视域下的生态本体论及其现实意义[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0(3): 24–31.
- [17] 王雨辰. 国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研究[M]. 武汉: 崇文书局, 2020: 27.
- [18] CHAKRABARTY D. The climate of history in a planetary age[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1.
- [19] 王雨辰, 周宜. 论西方环境伦理学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影响[J]. 伦理学研究, 2022(1): 70–78.
- [20] FOSTER J B, BURKETT P. Marx and the earth an anti-critique[M]. Boston: Brill Press, 2016: 58.
- [21] 福斯特, 何山青. 人类世时代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演进[J]. 国外理论动态, 2017(7): 93–103.
- [22] KOHEI SAITO. Marx in the anthropocene: Towards the idea of degrowth communism[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120.
- [23] ANGUS I. Facing the anthropocene: Fossil capital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earth system[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6.
- [24] MALM A. Fossil capital: The rise of steam power and the roots of global warming[M]. London & New York: Verso Press, 2016.
- [25] 纪逗, 白烨宏.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测度及区域时空差异研究[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1(1): 161–174.
- [26] FOSTER J B, JIA K Q. Ecological Marxism[J]. Monthly Review, 2023, 75(4): 35–50.
- [27] SAN ROMÁN Á, MOLINERO-GERBEAU Y. Anthropocene, capitalocene or westernocene? On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the current climate crisis[J].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2023, 34(4): 39–57.
- [28] SALA J E, TORCHIO G. Moving towards public policy-ready science: Philosophical insights on the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perspective for conservation science[J]. Ecosystems and People, 2019, 15(1): 232–246.
- [29] FOSTER J B, CLARK B. The capitalinian: The first geological age of the anthropocene[J]. Monthly Review, 2021, 73(4): 1–16.

- [30] MOORE J. Anthropocene or capitalocene? Nature, history, 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M]. Oakland: PM Press, 2016: 86.
- [31] WALLIS V. Red-green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and technology of ecosocialism[M]. Toronto: Political Animal Press, 2018.
- [32] SORIANO C. Anthropocene, capitalocene, and other “-Cenes”: Why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Marx’s Theory of value is necessary to leave the planetary crisis[J]. Monthly Review, 2022, 74(6): 1–28.
- [33] MALM A. Corona, climate, chronic emergency: War commun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M]. London & New York: Verso Press, 2020: 115–116.
- [34] WISSEN M, BRAND U. Emanzipatorische Perspektiven im “Anthropozän”. Über die Grenzen des grünen Kapitalismus und die Notwendigkeit einer radikalen Alternative[J]. PROKLA. Zeitschrift für Kritische Sozialwissenschaft, 2022(2): 263–281.
- [35] ROELVINK G. Rethinking species-being in the anthropocene[J]. Rethinking Marxism, 2013, 25(1): 52–69.
- [36] HORNBORG A. Nature, society, and justice in the anthropocen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10.
- [37] KOHEI SAITO. Why Ecosocialism needs Marx[J]. Monthly Review, 2016, 68(6): 59.
- [38] 王鸿宇, 蓝江. 资本主义治理逻辑的历史性考察: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0(6): 158–167.
- [39] 福斯特, 杨雷. 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地球: 生态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J]. 鄱阳湖学刊, 2023(5): 5–12, 123.
- [40] SAED. Nature is beyond value because we are part of nature[J].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2019, 30(2): 143–156.

Anthropocentrism in the Anthropocene: Innovation of ecological Marxism

ZHAO Ruifu

(School of Marxism,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Weak Anthropocentrism” ecological values in the research tradition, Ecological Marxist scholars, while refuting the accusations against the anthropocentric stance by various non-anthropocentric theoretical schools within the Anthropocene discourse, have substantively elaborated a new version of “Anthropocene Anthropocentrism” ecological values. This anthropocentric ecological value system, which emphasizes a historical time perspective of “long term”, a human capability view of “superficial direct influence-deep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a human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view that opposes “human privileges” while emphasizing “differentiated redistribution”, and a view of human ecological community relations based on “common interests”, serves as an optimized supplement to “Weak Anthropocentrism”. Ecological Marxism, while seeking to provide a fundamental support for eco-Marxist solutions to the Anthropocene crisis, still has theoretical limitations.

Key words: Anthropocene; Ecological Marxism; anthropocentrism; ecological values; Marxism ecology

[编辑: 郑伟, 郑泽星]